

贸易失衡引致了“逆全球化”吗

——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

高运胜 李之旭 朱佳纯

摘要：中美贸易摩擦深化引发学者们对“逆全球化”原因的思考。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数据，从增加值视角构建贸易利益指数，并结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全球化指数，研究贸易失衡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一国贸易利益受损是其“逆全球化”行为的重要动因。（2）贸易失衡会影响国家间的贸易政策、政治行为以及金融活动，进而导致“逆全球化”。（3）当面临贸易利益受损时，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政治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而发展中国家更多采取经济政策。本文为我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全球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失衡；逆全球化；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F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1) 09-0001-1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全球化”促成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腾飞，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难民潮问题突出，地区冲突频发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矛盾重重，国际社会不乏对“全球化”的质疑甚至反对。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脱欧派”险胜；同年美国大选，坚持“美国优先”、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当选。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长期性与复杂性，美国重点打击中国高端制造领域（如电子机械、通讯设备），并影响到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中的主要国家或地区。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技术封锁遏制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的深度延伸和全球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引发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和断裂。新冠疫情蔓延所导致的贸易限

[收稿日期] 2020-08-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价值链视角下的本地市场、创新资源投入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研究”（17BJL10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知识产权调查的触发机制、影响效应及应对策略研究”（19BJL11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指标测度、形成机理及效应分析研究”（19CJY025）

[作者信息] 高运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之旭（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lzx6877@163.com；朱佳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制也会减缓或甚至逆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在错综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下,曾经的“地球村”观念正在遭受贸易保护、控制移民、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行为冲击,局部国家的贸易保护正在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贸易保护(唐宜红和符大海,2017)^[1]。探寻垂直专业化分工导致的贸易失衡是否成为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克服“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Rodrik,2011)^[2],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世界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贸易利益分配与贸易失衡的问题,世界主要贸易国经常账户常常呈现贸易失衡状态(蔡兴,2018)^[3],贸易利益与“逆全球化”之间的联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各国在“全球化”中受益程度差异巨大,即贸易失衡是一些国家推动经济“逆全球化”的原因(陈建奇,2016)^[4]。同时,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与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开始超过发达国家(董琴,2018)^[5],因而发达大国在经济危机后推动的“逆全球化”与其在全球化中收益下降有关(刘志中和崔日明,2017)^[6]。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当下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在于“全球化治理”的低效率而非全球化本身,“贸易失衡”被发达国家故意夸大来转移矛盾焦点,以便实施贸易保护主义(韩召颖和姜潭,2018)^[7]。根据瑞士巴塞尔经济研究机构 Prognos 公司所作的调查报告,1990—2016年间被调查的42个国家GDP总值累计增长一万亿欧元,其中人均GDP增幅排名前五位均为发达国家,而印度、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速低于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依然是最大的受益者^①。

另一方面,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全球生产工序逐步细化,中间品贸易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部分,Daudin等(2011)^[8]提出垂直贸易的度量需要考虑最终产品中增加值部分的分配。如果在分析一国贸易失衡情况时仍然使用传统的海关统计方法测算贸易利益,占据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情况将被夸大,其贸易利益将被严重低估;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环节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出口包含大量国外价值的最终品,低劳动力成本使其充当着增加值“中转站”的角色(裴长洪和刘洪愧,2017)^[9],因此传统统计方法所呈现出的发展中国家高额贸易顺差中存在着“统计假象”(Rodrik,2006)^[10]。综上所述,贸易失衡与“逆全球化”密切相关,但受限于测算方法与分析视角,真实规模的贸易失衡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引致“逆全球化”尚不清楚,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贸易失衡造成“逆全球化”的作用机理,并结合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提出系列研究假说。然后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厘清各国真实贸易失衡情况,随后采用实证方法检验贸易失衡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排除“虚假繁荣”,重新审视“逆全球化”产生的动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在当今复杂外部环境下实现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m/201806/20180602757707.html>.

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以增加值贸易的视角，聚焦于近期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事件所关注的重点——贸易失衡和实际贸易利益问题，探究了贸易失衡是否引致“逆全球化”。第二，新的研究方法。针对以往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的不足，本文选取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对最终产品进行分解，创建了贸易利益指数（Trade Benefit Index, TBI），更准确地测算一国在参与全球化分工中的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贸易失衡情况，并采用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KOF）全球化指数^①，对贸易失衡情况与“逆全球化”展开回归分析。第三，新的研究发现。贸易失衡会影响国家间的贸易政策、政治行为以及金融活动，进而导致“逆全球化”。当面临贸易利益受损时，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政治手段，而发展中国家更多通过调整经济政策来保护自身利益。

二、研究假说与影响机制

根据传统贸易理论，贸易失衡是一国采取“逆全球化”等贸易保护政策的重要动因。“幼稚工业论”指出，一国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对外开放贸易利益严重受损时，政府会通过保护政策对其扶持，以提高其竞争能力。“最佳关税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依赖进口、贸易逆差过大时，为了提高自己国家的社会福利会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Johnson, 1953）^[11]。“战略性贸易政策论”则指出，政府应该给予企业补贴，支持企业抢占他国市场并将他国市场上的经济租金转移至国内（Brander and Spencer, 1985）^[12]，但这种政策势必会招致贸易对象国的强烈反应乃至报复，从而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故当一国贸易利益受损表现在面临外部垄断和市场扭曲现象时，采取贸易保护等一系列政策可以适当解决一个国家所存在的市场扭曲现象，从而提高该国的社会福利（Bhagwati, 1971）^[13]。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始终乏力，新兴国家寻求在全球性治理机制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而占据传统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不愿转让权力，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权展开了竞争（吴志成和吴宇，2018）^[1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贸易失衡会引致“逆全球化”的政策或措施。

贸易失衡对“逆全球化”的影响不仅在于贸易层面，也会对一国的政治和金融产生影响。从政治层面来看，贸易利益受损的国家会有减少参与国际组织、签订国际条约、国际公共产品与对外援助的“逆全球化”倾向。Samuelson（2004）^[15]则认为当前贸易秩序对美国不公平，且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为其他经济体所受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时也多次指责WTO多边贸易体制损害美国利益，虽重签北美自贸协定但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使美国与诸多贸易伙伴国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Rogowsky 和张丽娟，2018）^[16]。贸易失衡会影响一国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最终使政府通过政策干预来弥补损失或扭转劣势。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剑指“中国制造2025”产业规划，美国担心中国对高

^①<https://kof.ethz.ch/en/forecasts-and-indicators/indicators/kof-globalisation-index.html>

新科技产业扶植会形成对其战略高端产业的替代。

而从金融层面来看,严重贸易失衡会抑制一国金融开放与跨国投资。全球贸易不平衡带来金融不稳定性,贸易利益分配不均可能会导致债务问题,债务危机会随着投资与贸易进一步传导(张天桂等,2016)^[17],甚至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并引发金融危机,造成各国通过减少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以应对金融冲击。刘钻石和张娟(2017)^[18]发现 OFDI 对出口有显著替代作用,甚至引起国际收支逆差。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

假说 2: 贸易失衡会影响国家间的贸易政策、政治行为以及金融活动,进而导致“逆全球化”。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技术水平方面均差距悬殊,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低技能劳动失业增加与收入差距扩大,政府在缓解经济衰退上的乏力导致中下阶层民众利益受损而民粹主义盛行(Judis, 2016)^[19],国际移民大规模流动和难民危机带来就业岗位挤出,治安恶化及福利水平下降等社会倾销情形出现(郑春荣,2017)^[20],这些因素均迫使政府希望通过“逆全球化”缩小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陈继勇和陈大波,2017)^[21]。但是实际上西方国家政客往往将贸易逆差与社会不稳定归咎于商品自由流动,鼓动民众的“逆全球化”诉求以赢得政治上的支持(韩召颖和姜潭,2018)。贸易利益受损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弥合并转嫁内部社会矛盾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其为了维持贸易优势地位并遏制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借口。同时,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较容易通过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实现其利益目标。因此,当面临贸易利益受损时,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采取政治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先进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不断提升,科技服务部门与生产制造部门持续融合更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其自身在贸易格局中主导地位的担忧。Guo 和 N'Diaye (2009)^[22]发现,2001—2008 年中国净出口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贡献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40% 提高到 60% 以上,远远超过同期七国集团(16%)、欧盟地区(30%)及其他亚洲地区(35%)。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予的特殊优惠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通过廉价劳动力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以实现贸易顺差,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为推动自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来源。“出口导向”战略带来顺差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对国外高技术要素投入以及对发达国家及地区市场的过度依赖,产业发展被固化在价值链低端(倪红福和夏杰长,2016^[23];凌永辉和刘志彪,2018^[24])。故当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受损时,往往在经济政策或者措施上会对贸易利益的下降迅速做出反应,可能倾向采用“进口替代”的贸易保护政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

假说 3: 当面临贸易利益受损时,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政治手段进行“逆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更多采取经济政策来保护自身利益。

三、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传统海关统计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贸易政策制定，对“逆全球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全球价值链决定了中间品会依据国际分工在国家之间频繁流动，以总值贸易为基础的海关“统计幻象”大大高估了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以此衡量贸易利益分配必然会产生偏误（Srholec, 2007）^[25]。李昕和徐滇庆（2013）^[26]通过纠正重复计算、确认产权以及调整GDP等手段重新测算了我国的外贸失衡度和外贸依存度，发现实际外贸失衡度仅为官方统计的1/5，外贸依存度也降至官方统计的一半左右。王岚和盛斌（2014）^[27]则通过对中美双边总值贸易增加值进行分解，发现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在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之间存在严重错配，且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各国的进出口增加值，并构建贸易利益指数（TBI）以衡量真实贸易失衡情况，同时采用KOF全球化指数来衡量全球化程度，并展示相关的特征事实。

（一）贸易失衡情况的度量

本文沿用Koopman等（2014）^[28]、王直等（2015）^[29]学者构建的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最终品进行分解，用以追踪各国增加值的来源与去向。

根据投入产出原理，各国的产出可以表示为：

$$\begin{bmatrix} X_1 \\ X_2 \\ \vdots \\ X_G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I - A_{11} & -A_{12} & \cdots & -A_{1G} \\ -A_{21} & I - A_{22} & \cdots & -A_{2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A_{G1} & -A_{G2} & \cdots & I - A_{GG} \end{bmatrix}^{-1} \begin{bmatrix} \sum_r^G Y_{1r} \\ \sum_r^G Y_{2r} \\ \vdots \\ \sum_r^G Y_{Gr}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B_{11} & B_{12} & \cdots & B_{1G} \\ B_{21} & B_{22} & \cdots & B_{2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B_{G1} & B_{G2} & \cdots & B_{GG}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Y_1 \\ Y_2 \\ \vdots \\ Y_G \end{bmatrix}$$

X_i 表示总产出， Y_{ij} 表示 j 国对 i 国最终需求， A_{ij} 表示在 j 国的生产中所需要的 i 国的中间投入量， B_{ij}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接下来总产出拆分则有：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G} \\ X_{21} & X_{22} & \cdots & X_{2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G1} & X_{G2} & \cdots & X_{GG}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B_{11} & B_{12} & \cdots & B_{1G} \\ B_{21} & B_{22} & \cdots & B_{2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B_{G1} & B_{G2} & \cdots & B_{GG}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Y_{11} & Y_{12} & \cdots & Y_{1G} \\ Y_{21} & Y_{22} & \cdots & Y_{2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Y_{G1} & Y_{G2} & \cdots & Y_{GG} \end{bmatrix}$$

X_{ij} 表示 i 国生产 j 国吸收的产出, 同理 Y_{ij} 表示 i 国生产在 j 国消费的最终产品。

进一步地, 得到增加值产出矩阵 $\widehat{V}BY$:

$$\begin{bmatrix} \widehat{V}_1 & 0 & \cdots & 0 \\ 0 & \widehat{V}_2 & \cdots & 0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0 & 0 & \cdots & \widehat{V}_G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G} \\ X_{21} & X_{22} & \cdots & X_{2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G1} & X_{G2} & \cdots & X_{GG}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widehat{V}_1 \sum_r^G B_{1r} Y_{r1} & \widehat{V}_1 \sum_r^G B_{1r} Y_{r2} & \cdots & \widehat{V}_1 \sum_r^G B_{1r} Y_{rG} \\ \widehat{V}_2 \sum_r^G B_{2r} Y_{r1} & \widehat{V}_2 \sum_r^G B_{2r} Y_{r2} & \cdots & \widehat{V}_2 \sum_r^G B_{2r} Y_{rG}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widehat{V}_G \sum_r^G B_{Gr} Y_{r1} & \widehat{V}_G \sum_r^G B_{Gr} Y_{r2} & \cdots & \widehat{V}_G \sum_r^G B_{Gr} Y_{rG} \end{bmatrix}$$

其中 \widehat{V}_i 为增加值系数对角矩阵, 对角线上的元素即为各国被本国吸收的增加值, 通过增加值产出矩阵 $\widehat{V}BY$ 可以追踪增加值的来源和最终去向。

进一步地, 本文从传统指标贸易不平衡度 (杨杰, 2014)^[30]、贸易竞争力指数 (Trade Comparative, TC) (余道先和刘海云, 2008^[31]; 陈虹和章国荣, 2010^[32]; 赖明勇等, 2010^[33]) 中获得启示, 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构建贸易利益指数 (TBI):

$$TBI_i = \frac{\sum_j VA_absorbed_{ij} - \sum_j VA_absorbed_{ji}}{\sum_j VA_absorbed_{ij} + \sum_j VA_absorbed_{ji}} \quad (1)$$

其中 $VA_absorbed_{ij}$ 表示 j 国最终吸收的源于 i 国的国内增加值, $\sum_j VA_absorbed_{ij}$ 则表示所有其他国家吸收的源于 i 国的增加值, 同理 $\sum_j VA_absorbed_{ji}$ 表示 i 国吸收的源于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分子表示一国增加值贸易的净出口情况, 分母表示一国的增加值贸易总额。该指数的构建从最终产品 (需求端) 出发, 由不同国家最终需求所引动的增加值出口构建, 考虑增加值的最终流向, 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一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情况, 并且在国家之间更具有可比性。该指标反映了贸易失衡情况, 指数为正表示一国贸易顺差, 在全球贸易中受益, 为负则代表受损。该指数上升, 说明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相对其他国家分配到了更多贸易利益 (或者贸易利益损失减少)。主要经济体 2000—2014 年贸易利益指数如表 1 所示。

表1 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利益指数

年份	中国	美国	英国	韩国	德国	印度	巴西	日本
2000	0.1061	-0.1965	0.0043	0.1231	0.0806	-0.0448	-0.0612	0.1230
2001	0.0991	-0.1972	-0.0029	0.1143	0.1147	-0.0409	-0.0235	0.0756
2002	0.1103	-0.2229	-0.0137	0.1110	0.1784	-0.0284	0.1019	0.1118
2003	0.0968	-0.2432	-0.0024	0.1180	0.1635	-0.0332	0.1287	0.1280
2004	0.1053	-0.2582	-0.0113	0.1547	0.1856	-0.0662	0.1737	0.1348
2005	0.1640	-0.2706	-0.0104	0.1162	0.1812	-0.0887	0.1815	0.0982
2006	0.2066	-0.2563	-0.0056	0.0812	0.1788	-0.0811	0.1530	0.0920
2007	0.2426	-0.2172	-0.0073	0.0866	0.2002	-0.0929	0.0955	0.1027
2008	0.2307	-0.2002	-0.0086	0.0807	0.1887	-0.1016	0.0265	0.0608
2009	0.1755	-0.1307	-0.0066	0.1726	0.1810	-0.1210	0.0108	0.0654
2010	0.1479	-0.1531	-0.0222	0.1351	0.1745	-0.0865	-0.0231	0.0985
2011	0.1181	-0.1533	-0.0014	0.1076	0.1624	-0.0846	-0.0105	0.0090
2012	0.1363	-0.1426	-0.0120	0.1350	0.1887	-0.0878	-0.0350	-0.0299
2013	0.1347	-0.1329	-0.0155	0.1721	0.1838	-0.0090	-0.0728	-0.0512
2014	0.1749	-0.1329	-0.0149	0.1785	0.1998	-0.0047	-0.0912	-0.0548

资料来源：根据 WIOD 测算得到。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韩国和德国在全球贸易中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美国、英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在2000—2007年，凭借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贸易顺差增长迅速，贸易利益指数从2000年的0.1061增长到2007年的0.2426。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09年为0.1755。相比之下德国凭借其技术优势一直获得较高贸易利益，贸易优势地位更加稳固，2000—2014年贸易利益指数均值高达0.1708，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美国在2000—2008年贸易利益受损严重，2008年贸易利益指数为-0.2002，面临严重的贸易失衡，此后逐渐减缓。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WIOD计算了2000—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层面贸易利益指数。全球化指数来源于KOF，KOF对全球化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其构建的KOF全球化指数得到了IMF等国际组织机构以及研究机构广泛的应用和认可，能更直观地展现贸易利益分配与“逆全球化”的联系，并为我国在“逆全球化”大潮中制定合适的战略提供参考，指标构成如表2所示。其他控制变量诸如GDP、实际有效汇率、人口规模、全要素生产率（TFP）等均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①以及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ex, WGI）^②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③。

①<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②<https://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

③<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KOF 指标体系下的全球化综合指数 (KOF $Gldj$) 以及经济全球化指数 (KOF $EcGldj$) 反映了各国对外开放程度,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目前的开放水平以及对全球化的态度。本文绘制了这两项指标 2000—2014 年的变化趋势,指标的下降则代表一国在进行“逆全球化”,结果如图 1 所示。

从整体看,发达国家的综合全球化程度变化并不十分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在 2008 年之前全球化程度迅速提高,在经历经济危机后增速明显放缓,其全球化进程进入瓶颈期。而从经济全球化程度变化来看,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程度自 2000 年持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一开始持续上升,至 2008 年后才转为下降。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经济和贸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通过对比图 1 中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指数的变动趋势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进程更容易受到冲击的影响。

从图 1 中还可以注意到,尽管 2008 年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水平变化相反,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后二者变化开始趋同,无论是综合的全球化水平还是经济全球化水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曲线几乎平行,进一步反映出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网络发生深刻变化,价值链面临重构这一特殊背景下,全球各国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频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战略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会错失原本可以实现的“双赢”局面。

表 2 KOF 全球化指数介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数构成
全球化指数 (包括政策、措施、 法律、权利、 政府行为等方面) KOF $Gldj$	经济全球化指数 KOF $EcGldj$	贸易 KOF $TrGldj$	贸易规则(非关税壁垒、进出口合规成本)
			贸易税
			关税税率
			签订贸易协定数量
		金融 KOF $FiGldj$	投资限制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国际投资协定数量		
	社会全球化指数 KOF $SoGldj$	人际交往 KOF $IpGldj$	移动电话和固话人口占比
			出境自由程度
			国际机场数
		信息分享 KOF $InGldj$	拥有电视家庭占比
			网民占比
			媒体的法律环境、影响报道的政治压力、影响新闻和信息获取的经济因素
		文化交流 KOF $CuGldj$	性别平等程度
			人力资本
民权(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			
政治全球化指数 KOF $PoGldj$	政治活动 KOF $PoGldj$	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	
		签订的国际条约数量	
		双边投资条约伙伴国数	

资料来源:根据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 KOF 指标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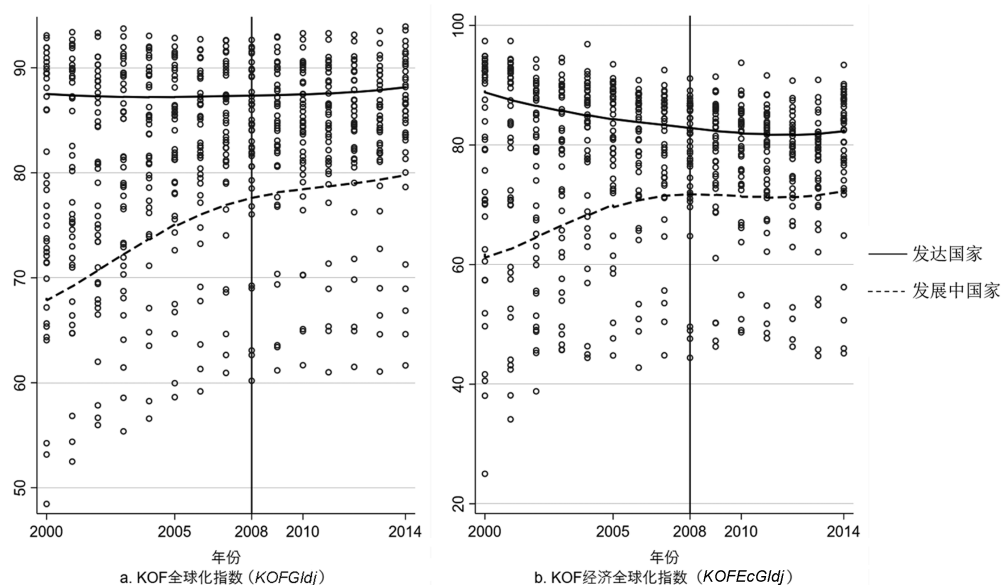


图1 2000—2014年全球化指数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表2数据计算得出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上文贸易失衡对“逆全球化”的理论机制分析，以及对贸易利益指数的测算，本文基于贸易失衡对“逆全球化”的影响进行经验验证。

(一) 实证模型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重点关注全球化综合指数和经济全球化指数，为了检验贸易失衡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KOFGLdj_{it} = \beta_0 + \beta_1 TBI_{it} + \beta_2 X_{it} + c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KOFEcGLdj_{it} = \beta_0 + \beta_1 TBI_{it} + \beta_2 X_{it} + c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式(2)中的被解释变量 $KOFGLdj_{it}$ 是采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等来度量的全球化综合指数，其数值越大说明该国全球化程度越高，该数值减少则代表一国在进行“逆全球化”；式(3)中的 $KOFEcGLdj_{it}$ 专指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指数，采用经济层面的一系列指标度量。 X_{it} 为控制变量集合，考虑到国家层面的因素，如人口、GDP、资本存量、管理质量，以及汇率波动等对于全球化的影响（蔡兴，2018；鲁慧鑫等，2020^[34]），本文纳入以下控制变量：管理质量（ RQ ）、实际汇率（ EXR ，以美元为基准）、GDP、资本存量（ CK ）、通货膨胀率（ $INFR$ ）、人口（ POP ）、全要素生产率（ TFP ）。而 c_i 、 λ_t 、 ε_{it} 则分别表示国家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误差项。考虑到不同变量水平值的巨大差异，在实际估计过程中，我们对汇率、资本存量、GDP、人口进行了对数处理。

(二) 基准回归

表3给出了基准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利益指数将对全球化综合指数和经济全球化指数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结合基准回归结果和前文的机理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即一国的贸易利益受损将对该国的全球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会催生该国经济的“逆全球化”，假说1成立。同时，管理质量（RQ）反映了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和法规的能力，也体现了政府的效率。可以看出管理质量对于KOF全球化指数影响正向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开展全球贸易以及参与全球治理。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i>KOFGldj</i>	<i>KOFecGldj</i>	<i>KOFGldj</i>	<i>KOFecGldj</i>
<i>TBI</i>	11.5545*** (3.5239)	17.9309** (8.0930)	13.5286*** (4.4743)	29.9941*** (10.2392)
<i>RQ</i>			2.6181** (1.2280)	6.2047*** (2.2698)
<i>lnEXR</i>			1.2048 (1.4977)	1.5139 (2.9657)
<i>TFP</i>			-3.5953 (3.7910)	-3.8401 (9.5004)
<i>INFR</i>			-0.0351 (0.0268)	-0.0469 (0.0658)
<i>lnCK</i>			-0.9086 (1.6013)	-7.2743* (4.0503)
<i>lnGDP</i>			14.2560*** (3.3701)	22.6525*** (6.5055)
<i>lnPOP</i>			-3.3101 (12.0593)	31.2042 (26.6418)
常数项	78.8511*** (0.6673)	77.1463*** (1.3574)	-83.0214** (39.7204)	-205.9310*** (75.364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15	615	615	615
R ²	0.4420	0.1286	0.5911	0.2662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显著，下表同。

(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

考虑到上一轮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且发达国家自身全球化水平高，因此贸易失衡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对于本文重点关注的经济全球化指数，贸易利益指数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部分发达国家虽然面临增加值贸易逆差，但物美价廉的中间和最终产品源源不断输入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极大提升了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同时跨国公司从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贸易利益的下降可能对其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影响有限，发达国家可能

出于其他目的倡导“逆全球化”：美国特朗普新政带有明显的“技术封锁”目的，是为巩固其优势地位并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英国“脱欧”也带有复杂社会因素（如社会倾销、移民问题等）和政治色彩。相较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以出口收益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当其参与国际分工所分配到的贸易利益下降时，国家在经济政策或者措施上会迅速做出反应，阻碍其融入全球化进程。

表4 分样本回归结果

项目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	(2)	(3)	(4)
	<i>KOFGI_{dj}</i>	<i>KOFEcGI_{dj}</i>	<i>KOFGI_{dj}</i>	<i>KOFEcGI_{dj}</i>
<i>TBI</i>	1.7582 (2.4451)	-4.9220 (4.9649)	2.6917 (3.4819)	17.6526** (8.2024)
<i>RQ</i>	-0.0052 (0.7695)	1.2409 (1.4541)	3.1820** (1.4538)	5.9077 (4.0413)
<i>lnEXR</i>	1.6492 (1.8037)	6.3603* (3.2672)	-2.5015 (1.7365)	-6.6296 (4.3535)
<i>TFP</i>	-4.6995** (1.9807)	2.9254 (3.3279)	-13.8471** (4.9218)	-26.8819 (15.8847)
<i>INFR</i>	-0.1736 (0.1252)	-0.4681* (0.2617)	0.0691* (0.0341)	0.1017 (0.0770)
<i>lnCK</i>	-2.0612 (1.7859)	-4.2615 (3.7483)	-1.3866 (1.8758)	-9.4542 (5.9520)
<i>lnGDP</i>	14.6198** (5.9511)	25.4249** (11.5989)	2.4846 (3.0477)	5.2565 (7.1524)
<i>lnPOP</i>	-10.3630 (10.6463)	-4.1254 (21.6882)	6.0793 (9.2520)	61.4237*** (19.5982)
常数项	-45.0812 (70.9592)	-186.2993 (143.7160)	49.7284 (38.4215)	-25.7791 (67.1176)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30	330	285	285
R ²	0.3862	0.6917	0.8603	0.5349

(四) 稳健性分析

考虑到贸易利益与全球化程度可能存在内生性关系，本文将滞后一期的贸易利益指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且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同时，本文采用贸易增加值（DVA）重新构建TBI指数并进行检验，结论依然稳健^①。

^①由于篇幅限制，完整回归结果备索。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阅、下载。

(五) 拓展性分析

前文提到贸易失衡将从贸易、政治和金融等方面影响一国的“逆全球化”行为，本部分从KOF指数的子指标（三级指标）出发，分别考察贸易失衡对一国贸易全球化指数 $KOFTrGldj_{it}$ 、金融全球化指数 $KOFFiGldj_{it}$ 以及政治全球化指数 $KOFPoGldj_{it}$ 的影响，以探究贸易失衡影响一国“逆全球化”行为的机制。

从表5的结果来看，贸易失衡对于贸易全球化指数、金融全球化指数均有显著影响，为了考察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继续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子样本进行机制分析。

表5 拓展性分析

项目	(1)	(2)	(3)
	$KOFTrGldj$	$KOFFiGldj$	$KOFPoGldj$
<i>TBI</i>	33.4647*** (10.0127)	26.6821** (11.2882)	8.6775 (5.7125)
<i>RQ</i>	5.4683** (2.5956)	6.9552** (2.8921)	3.0772** (1.3426)
<i>lnEXR</i>	4.5901 (3.9680)	-1.5476 (3.9137)	1.0543 (1.3005)
<i>TFP</i>	-5.3000 (11.1757)	-2.2077 (9.5763)	-3.7472 (4.6907)
<i>INFR</i>	0.0758 (0.0715)	-0.1692 (0.1054)	0.0446 (0.0438)
<i>lnCK</i>	-7.9728** (3.7949)	-6.5933 (5.5394)	0.6581 (2.1967)
<i>lnGDP</i>	20.4197*** (7.5325)	24.8705*** (7.1475)	9.5357** (3.6796)
<i>lnPOP</i>	26.3436 (27.0448)	36.4343 (28.4835)	-22.2166* (11.5367)
常数项	-155.4382* (82.8949)	-257.1832*** (79.8309)	15.2913 (36.5613)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615	615	615
R ²	0.2464	0.2705	0.6314

对比表6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会影响其政治活动，比如参加的国际组织数量、签订国际协议的情况等，这与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的频繁“退群”以及英国“脱欧”等表现相一致；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则主要影响其贸易和金融等经济活动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变化、投资限制等。这一结果与现实亦有相符之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较容易通过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实现其利益目标；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人微言轻”，当面临贸易利益受损时更偏向于采用经济手段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根据上文的分析和实证检验，假说2和假说3得到验证。

表6 分样本的拓展分析

项目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1)	(2)	(3)	(4)	(5)	(6)
	<i>KOFTrGldj</i>	<i>KOFFiGldj</i>	<i>KOFPoGldj</i>	<i>KOFTrGldj</i>	<i>KOFFiGldj</i>	<i>KOFPoGldj</i>
<i>TBI</i>	0.1761 (5.0988)	-9.7859* (5.6387)	5.7104** (2.2827)	16.6076** (7.6696)	18.6977* (10.4634)	-6.0591 (8.9519)
<i>RQ</i>	2.5639 (2.0829)	-0.0771 (2.0121)	0.2108 (0.6268)	2.5650 (4.2559)	9.2504 (5.7751)	4.5462* (2.1858)
<i>lnEXR</i>	13.9943*** (4.8874)	-1.1826 (4.5876)	1.0066 (2.1376)	-4.9824 (3.6129)	-8.2768 (6.7427)	-0.4805 (2.0471)
<i>TFP</i>	2.2350 (6.8047)	3.9523 (4.9767)	-4.6826 (2.8292)	-38.8632*** (13.1173)	-14.9005 (21.6056)	-17.5980 (11.8743)
<i>INFR</i>	-0.6589* (0.3461)	-0.2667 (0.2443)	-0.0285 (0.1381)	0.1973** (0.0841)	0.0060 (0.1106)	0.1334** (0.0609)
<i>lnCK</i>	-9.8068* (5.4422)	1.2959 (4.7824)	-3.4985 (2.2379)	-8.8650* (4.8755)	-10.0434 (8.0958)	1.1175 (3.6853)
<i>lnGDP</i>	22.7712 (16.3706)	27.9545*** (8.3263)	11.9698* (5.9455)	4.8500 (6.4355)	5.6630 (10.2092)	0.6253 (6.9057)
<i>lnPOP</i>	-7.4777 (30.9089)	0.2817 (19.0176)	-10.2328 (10.7728)	50.8637** (18.0649)	71.9836*** (24.5354)	-31.0412** (14.2647)
常数项	-68.8960 (197.8548)	-305.6204** (113.8712)	14.2544 (77.1499)	7.9303 (70.3938)	-59.4886 (89.1076)	150.4501** (62.057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30	330	330	285	285	285
R ²	0.4631	0.7250	0.6451	0.5534	0.3925	0.7514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最新的 WIOD 数据库, 测算了 2000—2014 年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层面的贸易利益指数, 并利用该指数以及 KOF 全球化指数探究贸易失衡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 总体来看,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贸易失衡会催生“逆全球化”政策; 贸易失衡将从贸易政策、政治行为以及金融活动等方面带来一国的“逆全球化”行为; 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看, 贸易失衡只是发达国家采取经济“逆全球化”政策的表象, 巩固霸主地位并阻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能才是其真正目的, 而较为依赖出口提振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关注实际贸易利益的下降, 因此贸易失衡会影响发达国家的政治行为, 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使用经济手段来应对贸易失衡; 同时, 发展中国家提升管理质量更有助于其融入全球化, 而发达国家可能由于本身全球化程度较高, 提升管理质量的作用不明显。

我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特殊, 且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疫情之后的全球化走向, 中国应该与欧洲国家一起推动对“一带一路”沿线,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救助与共同开放, 以及向更加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全球供应链升级 (冯维江, 2020)^[35], 抓住机遇将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本文的结论对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 积极有效应

对“逆全球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启示。

（一）逐步缓解贸易不平衡，扩大开放以推动“外循环”发展

扩大出口对我国入世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快速融入国际分工“功不可没”。然而，从融入全球化程度与经济发展质量来看，我国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不断升级的“逆全球化”浪潮，我国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继续坚定不移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扩大高新技术与原材料进口，以逐步缓解贸易顺差引发的国家间纷争，还将对我国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及维持国内供应稳定产生积极影响。国际分工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常态，传统总值核算方法的种种弊端逐渐显现。为了厘清国际贸易的真实情形以及我国在全球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国应当在核算方式上不断优化，以免因为总值贸易核算所带来的偏误而被动地成为“受益者”或者“受害者”，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正确的方向。

（二）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强调自主创新发展

贸易失衡问题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采取“逆全球化”政策的根本原因，其目的可能在于抑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应该逐渐摆脱对国外高技术要素投入的依赖，寻找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优势的差异性，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在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抓住区域一体化浪潮带来的机会，以“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建设以及中欧投资协定（CAI）等为契机，扩展中国与周边地区产能合作范围，从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落后方转换为区域价值链中的相对技术先进方，接触甚至控制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扩大向“一带一路”沿线中间品与服务出口，增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实现创新发展，摆脱要素投入路径依赖的“低端锁定”模式，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三）强调互利共赢，避免“以邻为壑”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趋势说明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双方实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采取“逆全球化”措施只会进一步缩减国际贸易规模，降低贸易增速、阻碍贸易复苏进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国家提出的“贸易利益受损”问题。贸易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开放程度，推进全球化参与的重要动力，我国应当针对不同国家所关注的利益“痛点”进行有导向性的交流合作，不断密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同时强化与发达国家深入交流，加快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以期尽快平息全球化大势下的“逆全球化”浪潮。特别是应该促进中美两国互利共赢，让中美双方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推动力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计划”为未来两国在交通、能源、通讯、电力等多个产业的基础设施领域深入合作，发挥中国产能优势、缓解美国资金缺口提供可能。另外，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也为美国低碳环保、清洁能源等高端制造业与金融保险、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健康卫生、文化商贸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四）打破国内区域间贸易壁垒，巩固国内价值链

完善国内价值链有利于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并为本地市场提供更为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应该打破区域间的贸易壁垒,并逐步缓解地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加快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从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收入的提高,形成良性循环。这将成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并融入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强有力的支撑。在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会破坏全球价值链,减少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此时完善国内价值链能够逐步转移外部风险,对此应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提升国内主要区域一体化进程,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提高生产率来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和发展,从而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获得相对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 [1] 唐宜红,符大海. 经济全球化变局、经贸规则重构与中国对策——“全球贸易治理与中国角色”圆桌论坛综述 [J]. 经济研究, 2017, 52 (5): 203-206.
- [2] RODRIK D.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2011, 11 (3): 816-817.
- [3] 蔡兴. 制度质量、金融发展与全球失衡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8): 163-174.
- [4] 陈建奇. 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挑战与“中国方案” [J]. 国际贸易, 2016 (11): 20-24.
- [5] 董琴. “逆全球化”及其新发展对国际经贸的影响与中国策略研究 [J]. 经济学家, 2018 (12): 91-98.
- [6] 刘志中, 崔日明.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演进与中国的角色变迁 [J]. 经济学家, 2017 (6): 50-57.
- [7] 韩召颖, 姜潭. 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 94-102.
- [8] DAUDIN G, RIFFLART C, SCHWEISGUTH D.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 [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44 (4): 1403-1437.
- [9] 裴长洪, 刘洪愧. 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 一个新的分析思路 [J]. 经济研究, 2017, 52 (5): 26-43.
- [10] 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6, 4 (5): 1-19.
- [11] JOHNSON H G. Optimum Tariffs and Retalia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3, 21 (2): 142-153.
- [12] BRANDER J A, SPENCER B J.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18 (1): 82-100.
- [13] BHAGWATI J N. Trade-Diverting Customs Unions and Welfare-Improvement: A Clarification [J].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1, 81 (323): 580-587.
- [14] 吴志成, 吴宇. 逆全球化的演进及其应对 [J]. 红旗文稿, 2018 (3): 32-34.
- [15] SAMUELSON P A.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8 (3): 135-146.
- [16] ROGOWSKY R A, 张丽娟. 就业保护与美国贸易保护新阶段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3): 1-11.
- [17] 张天桂, 盛垒, 薛安伟, 等. 分化复苏的世界经济: 新引擎、新风险、新常态——2016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6 (1): 3-27+135.
- [18] 刘钻石, 张娟. 金融发展、出口替代与贸易失衡 [J]. 财贸研究, 2017, 28 (8): 33-43.
- [19] JUDIS J B. 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M].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6: 32-38.
- [20] 郑春荣. 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 [J]. 国际展望, 2017, 9 (1): 34-51+145-146.
- [21] 陈继勇, 陈大波. 特朗普经贸保护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J]. 经济学家, 2017 (10): 96-104.
- [22] GUO K, N'DIAYE P. Is China's Export-Oriented Growth Sustainable? [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No. 09/172, 2009.
- [23] 倪红福, 夏杰长. 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 [J]. 财贸经济, 2016 (10): 87-101.

- [24] 凌永辉, 刘志彪.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轨迹、逻辑与战略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分析 [J]. 经济学家, 2018 (7): 45-54.
- [25] SRHOLEC M. High-Tech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mptom of Technology Spurts or Statistical Illusion?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7, 143 (2): 227-255.
- [26] 李昕, 徐滇庆. 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 29-55+205.
- [27] 王岚, 盛斌.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 [J]. 财经研究, 2014, 40 (9): 97-108.
- [28] KOOPMAN R, WANG Z, WEI S 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 (2): 459-494.
- [29] 王直, 魏尚进, 祝坤福. 总贸易核算法: 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9): 108-127+205-206.
- [30] 杨杰. 中韩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对比分析——基于2001年~2010年的数据样本 [J]. 产业经济评论, 2014 (6): 111-116.
- [31] 余道先, 刘海云.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 (10): 73-79.
- [32] 陈虹, 章国荣. 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0 (10): 13-23.
- [33] 赖明勇, 钟文华, 谢锐. “后雁行模式”下的中韩电子信息产业贸易——合作还是竞争?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0 (5): 75-81+89.
- [34] 鲁慧鑫, 郭根龙, 冯宗宪.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5 (2): 45-57.
- [35] 冯维江. 应对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浪潮的中国方案 [J]. 世界知识, 2020 (11): 22-24.

(责任编辑 白光)

The Trade Imbalance Caused Anti-globalization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GAO Yunsheng LI Zhixu ZHU Jiachun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s has caused scholars' discussions about the reasons for "Anti-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0 to 2014 on the World Input and Output Datab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trade imbalances o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Trade Balance Inde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dded and referring to the KOF Globalization Index from the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1) In general, the damage to a country's trade interests is an important motive for "Anti-globalization" behavior. (2) Trade imbalances will affect trade practices, political actions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among countries, leading to "Anti-globalization". (3) When faced with the damage to trade interests, developed countries tend to adopt political moves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tend to adopt economic policies.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under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Keywords: Trade Imbalance; Anti-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